

戈夫曼社会研究方法述评

王 晴 锋

摘 要：欧文·戈夫曼是二战后重要的西方社会学家。戈夫曼未系统性地阐述方法论并采用非常规性资料搜集方法和分析技术，因此常被人误以为他不重视方法。戈夫曼质疑传统的社会研究方法，将自身视为面对面互动领域的探索者。戈夫曼的社会研究方法可分为四种类型，即传统的民族志田野研究、系统性的参与观察、非系统性的自然主义式观察和文献研究。而他的资料分析技术则包括重新分类与命名、逆向论证、比较法与复调论证等，它们共同展现了戈夫曼的思维特质，诸如类型化、从无序和反常反观有序和正常以及“纳须弥于芥子”的认知哲学。通过这一整套颇具特色的资料搜集方法与分析技术，戈夫曼系统地探讨了微观互动领域，并阐释互动秩序是何以可能的。

关键词：戈夫曼 田野研究 民族志 自然主义式观察 社会研究方法

作者王晴锋，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1）。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以拟剧论在群星荟萃的西方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他的著述在人文社科领域一直保持很高的引用率。秉承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以来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传统，戈夫曼坚持田野研究，他的很多著述都基于典型的社会学人类学调查，他还曾多次指出 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的社会学领域未能培育充足的民族志学者，导致该传统青黄不接。^① 在研究主题上，戈夫曼以都市生活为主要内容，践行“休斯式都市民族志”。^② 他以日常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和资料来源，将街道、电梯、办公室等生活和工作场所视为重要情境，个人细碎甚至漫不经心的谈话以及举手投足和表情神态等都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严肃话题。由于戈夫曼没有系统性地论述他的社会研究方法，以致于人们认为他对方法论问题不够重视。^③ 事实上，戈夫曼在很多著作中都会对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作出一定的说明，并强调方法论的反身性和自

① John Lofland, "Erving Goffman's Sociological Legacies," *Urban Life*, vol. 13, no. 1, 1984, p. 14.

② Jef C. Verhoeven, "An Interview with Erving Goffman, 1980,"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vol. 26, no. 3, 1993, p. 318.

③ 诸如 Howard S. Becker, "The Politics of Presentation: Goffman and Total Institutions,"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 26, no. 4, 2003, p. 660.

我意识。^①

日常生活中的互动细节是微观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然而，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尚没有现成的理论可用于阐释面对面对面互动领域，也没有成熟的分析框架用于整理从日常生活中搜集来的琐碎杂乱的数据资料。因此，对于面对面互动研究而言，戈夫曼采用的资料来源、数据搜集方法以及分析技术等均具有开创性意义。他的研究方法为获取和整理这些原始资料提供了可行的手段，也正是凭借着这套研究方法，戈夫曼得以深入探讨原先被忽略的社会学的基本事实，并最终使互动秩序成为独立、合法的研究领域。本文通过较为全面地梳理戈夫曼的著述，从他关于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出发，剖析戈夫曼的社会研究方法，尤其是资料搜集方法与资料分析手段。大体而言，戈夫曼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定位影响着他的研究方法，而研究对象的属性决定了资料搜集的来源，以观念为导向的研究意图则决定了资料的分析方式。最后本文以对戈夫曼社会研究的相关批评与回应作为结束。通过系统性地研究戈夫曼的社会研究方法，一方面，有助于澄清认为戈夫曼不够重视甚至忽略方法的误解，另一方面，对于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尤其是定性研究，戈夫曼采用的研究方法亦不乏借鉴意义。例如，定性研究有时过于倚重（结构性）访谈，对此，戈夫曼主张的非系统性的自然主义式观察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路径。^②

一、社会研究的认识论

（一）对社会学的学科定位

20 世纪 40—50 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关于面对面互动的分析边界不甚清楚，在自然场景中研究面对面互动也尚未具备充分的名义，它还未能登堂入室、进入主流社会科学的领地。戈夫曼的学术努力正是为了厘清微观人际互动的研究边界并为其正名，也即确立面对面互动研究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戈夫曼信奉自然主义，认为经验基础对一门仍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学科而言至关重要，他主张若要弄清楚微观社会世界，必须眼观耳闻、亲身体验。在戈夫曼当时看来，自然科学相对较为严谨、规范，而社会科学尚未达到这种成熟程度，并认为将社会研究以自然科学的形式加以描述仅是一种“修辞”。^③ 因此，戈夫曼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抱着极为谦逊的态度。

戈夫曼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尚未成熟学科的科学家的探索者，一个仍有待充分开发领域的探索者，而他的学术任务主要是以观念为导向，确立关于面对面互动的普遍性解释框架，经验资料在观念形成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戈夫曼试图通过对一些基本变量的选择和初步检验使纷繁驳杂的原始数据资料获得一定的秩序性，并勾勒出这个崭新的微观互动领域的轮廓，包括其可能的形式、过程、规则、任务和问题等。戈夫曼认为，尽管存在各种局限和难以避免的偏见，尽管对全局的理解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任意选择的某些事物之维度，尽管我们也没有对为何选择某部分社会肌理进行研究提供充足的理由，但研究者还是能够在一定限度内使资料组织化和秩序化，

①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p. 12.

② 戈夫曼的社会理论尤其是他的拟剧论和框架分析等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他的研究方法。

③ P. M. Strong, "Minor Courtesies and Macro Structures," in P. Drew and A. 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88, p. 229.

能够对行为的要素或构成进行概化的描述,仍然可以根据研究资料得出某些原先并不存在于脑海里的结论。关于研究资料的择取,戈夫曼认为,任何主观经验在真实性上并不逊色于其他事物。正是对社会科学的这种认知态度决定了戈夫曼采用在很多人看来并不科学和较为随意的研究方法、资料来源以及措辞风格。

从20世纪40—50年代之交对英国北部的设特兰岛社区进行参与观察开始,戈夫曼采取一种“探索性的、散文式和分类化的社会学方法”。^①戈夫曼承认观念图式可能不足以充分描述社会世界的复杂性与异质性,但他仍较为注重观念性的区分,因为这些区分表明社会学家揭示了某些能够使事物简化或归类的基本变量。社会学的观念并非仅是研究者个人纯粹主观的创造,它具有现实的基础,也正因此如此,社会学者能够相对客观地研究社会,而且具有不同背景差异的人仍然能够就某些社会事实达成基本共识。戈夫曼亦遵循韦伯主义的传统,认为社会学可以通过价值中立的立场进行研究,或将这种价值中立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理想型”。^②戈夫曼的本体论假设隐含着具体化的、可观察的实体,这是移情式理解的前提和基础。

(二) 对传统社会研究方法的质疑

对戈夫曼而言,社会学发现不是对先前未知事实的预先或未曾意料的发现,它更像是对已知事物进行不同意义的归因。如果社会学的发现是关于已知事物的重新秩序化,那么社会学方法必须是那些尽可能有效地和可靠地促进这种重新秩序化的方法。^③传统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通常是先提出假设,然后通过观察进行检验,以证实或证伪它。戈夫曼认为,将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人际互动领域存在严重的局限性:

此类研究始于这样的句子:“我们假设……”,直到充分讨论所提出的设计的偏差和局限性、导致产生无效变量的原因,并以令人满意的显著相关性肯定某些假设而告终:好像社会生活的发现就如此之简单。它涉及某种移情戏法,其潜在的假设是只要你完成了科学的规定动作,就会产生科学的结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自然主义研究的领域尚有待发现。重塑我们关于社会活动之看法的观念仍未出现。也没有建立能不断地将大量事实置于其中的分析框架。总之,我们对日常行为的理解并没有加深,反而日益疏远。^④

在戈夫曼看来,研究面对面互动的社会学家不可能像实验室里的化学家那样,仿佛依照实验程序按图索骥便能获得理想的科学结论。社会科学在理解和解释生活世界的事件与本质时,它面对的是已被阐释的事实,也就是说,构成“客观”资料来源的事件、行动和经验本身已经是日常生活中已知的观念化产物。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被“双重阐释”的世界。^⑤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活形式,它不断地重新阐释生活的意义框架。有关实践知识的观察是在具体情境里获得其有效性和合法性的,但是,观察行为本身并不能产生有效的知识,否则抽象思维与演绎逻辑就显得多此一举。而且通过观察得到的“事实”无法自我证明,它们关于生活世界的理

① Greg Smith, *Erving Goffm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6.

② Jef C. Verhoeven, “An Interview with Erving Goffman, 1980,” p. 326.

③ Robin Williams, “Understanding Goffman’s Methods,” in P. Drew and A. 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p. 73.

④ Erving Goffman,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 xvi.

⑤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论阐释可能与“研究者本人的理论、假设、概念和分析相抵牾”。^① 社会科学的研究通常是努力使这两者保持协调一致，为此，研究者往往同时操控需要解释的事物和解释框架，犹如木匠通过改变门的形状或门框的大小使两者相契合。然而，社会科学在揭示、呈现规律时，对这种本质性的思维逻辑却秘而不宣、避之不谈。

二、资料搜集方法

纵观戈夫曼一生的著述，可以归纳出四种研究方法，即典型的民族志研究、系统性的参与观察、非系统性的自然主义式观察以及广泛的文献研究，它们是戈夫曼搜集微观互动细节材料的重要方式。

第一，典型的民族志田野研究。戈夫曼在学术生涯早期主要采取民族志研究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关于设特兰岛的社区研究和圣伊丽莎白医院的研究。从1949年12月至1951年5月期间，戈夫曼在位于苏格兰北部设特兰群岛的恩斯特岛上开展了为期12个月的田野调查，这是一项标准的民族志研究，由此完成了他作为民族志学者的成人礼。戈夫曼当时是以“想亲身体验岛上农耕经济的美国大学生”的身份进入田野，主要关注迪克森（Dixon）当地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日常事件，尤其聚焦于旅店、台球室以及公共会堂等社交场所。通过对设特兰岛的研究，戈夫曼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一个岛屿社区的沟通行为》，^② 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成享誉学术界的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1955年至1956年，戈夫曼在位于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研究。戈夫曼进入田野的角色是医院体育部的主任助理，公开的身份是“娱乐和社区生活的研究者”，^③ 医院的高层管理者都知晓戈夫曼的研究意图。通过这项研究，戈夫曼完成了《收容所》一书，详细论述了住院病人主观体验的机构化世界。

在1974年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戈夫曼总结了他对田野研究的一些观点。在他逝世之后，当时的发言录音被整理成文字稿《论田野工作》，由其遗孀授权公开发表于《当代民族志杂志》。^④ 在该文中，戈夫曼着重探讨了作为资料搜集手段的参与观察，并向实地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实际建议，具体包括：浸入主体的生活环境、注意各类身势反应、移情、坦诚相交以及策略性地处理社会等级关系。在4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建议和原则已经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田野工作者的基本共识。

第二，系统性的参与观察。20世纪40—50年代之交，戈夫曼在对设特兰群岛的孤岛社区进行民族志研究时，曾明确指出他真正的目标是“成为一个观察性的参与者，而不是参与性的观察者”。^⑤ 也就是说，他主要不是作为观察者，而是参与者。这一信条也指导着他后来的田野研究。戈夫曼主要进行了两项系统性的参与观察：一项是内华达赌场的研究；另一项是关于电台脱口秀的研究。

① Robin Williams, “Understanding Goffman’s Methods,” in P. Drew and A. Wootton, eds., p. 73.

② Erving Goffman, “Communication Conduct in an Island Community,” Ph. D. disser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3.

③ Erving Goffman,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Anchor, 1961, p. ix.

④ Erving Goffman, “On Fieldwor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vol. 18, no. 2, 1989, pp. 123-132.

⑤ Erving Goffman, “Communication Conduct in an Island Community,” p. 2.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戈夫曼对赌场的赌博行为开展实地调查,他频繁前往内达华州的各大赌场,并选择拉斯维加斯一家名为“站点广场”(Station Plaza)的赌场,蹲点观察里面的主持人、发牌者和“二十一点”玩家。他还经过培训成为合格的“二十一点”发牌者,甚至成为赌场监赌人。虽然戈夫曼没有将他的赌场研究写成专著,但这些亲身体验为他写作《行动的位置》(*Where the Action Is*)一文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素材。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戈夫曼的学术旨趣转向社会语言学。为此他专门研究了电台脱口秀,这也是戈夫曼最后的田野研究。他简要观察了费城一家古典音乐电台,对音乐节目主持人(DJ)进行了访谈。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记录和分析电台播音员的专业广播话语,找出其中的话语过失,如口误、说漏嘴、冒失和信口开河等,以及他们如何用各种补救行动进行纠正。戈夫曼认为,与面对面的谈话互动相比,通过了解电台谈话“可以一瞥日常话语的独特结构性特征”。^①根据这次研究,戈夫曼写成了《回应性叫喊》和《电台谈话:一项关于我们的口误方式的研究》两篇文章,后来收录于《谈话形式》(*Forms of Talk*, 1981)一书。

系统性的参与观察还包括其他一些短期的田野研究。例如,戈夫曼在1954年至1957年间从事有关精神健康方面的研究时,除了圣伊丽莎白医院之外,他还研究了哥伦比亚特区的另一家精神病院(1954—1955),其中某些材料用于《论恭敬与风度的本质》一文。^②20世纪50年代末,戈夫曼还在加州伯克利的赫里克纪念医院(Herrick Memorial Hospital)观察外科手术室,该研究为《角色距离》一文提供了经验资料。此外,关于精神病院的田野研究还散见于《精神病症状与公共秩序》、《场所的疯癫性》^③等其他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公共场所的行为——论聚集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有很多材料也是来自戈夫曼在精神病院的参与观察。^④

第三,非系统性的自然主义式观察。戈夫曼信赖对社会生活直接进行观察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但也对研究人类行为时过于倚重访谈资料的做法持谨慎态度。他主张采取自然主义式观察,设法将人们对相应事件的叙述进行三角定位。^⑤自然主义式研究是指在避免对个体产生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将社会互动置于自然发生的情境之中,用不同的观察技术详细搜集各种资料,包括举止、容貌、言谈以及背景信息等。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研究难以通过传统的结构化研究(如访谈和问卷调查)得到所需的信息。因此,戈夫曼偏爱非正式和非系统性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的身体在场,通过直接的、不失时机的细节观察获得经验资料。戈夫曼的自然主义式观察具有两个特征,即非系统性和高度选择性,它聚焦于人际互动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一些维度,如历史、政治与文化等。^⑥

非系统性的自然主义式研究主要聚焦于日常生活的观察,它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同时也包含了作为研究者(作者)的戈夫曼与被研究者(读者)之间共同的经验感知。戈夫曼将自然主义式观察融入自身的日常生活,利用有意无意听到的谈话和观察到的细微场景作为论述材料的来源。戈夫曼

① Erving Goffman, *Forms of Tal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p. 324.

② Erving Goffman, "The Nature of Deference and Demeano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6, vol. 58, no. 3.

③ 即"The Insanity of Place",该文后收录于《公共关系:公共秩序的微观研究》,参见 Erving Goffman,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④ Erving Goffman,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p. 224.

⑤ Erving Goffman, "On Fieldwork."

⑥ Philip Manning, *Erving Goffman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1992, p. 148.

几乎所有的著作都包含着这种形式的观察，在此基础上，他提炼出很多有价值的术语与概念，诸如礼节性忽视、回应性叫喊、面子工夫等。20 世纪 40—50 年代，戈夫曼的这种类似于分析归纳法的自然主义式观察在芝加哥学术圈里甚为流行，并且后来由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安塞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发展成为“扎根理论”。^①但是，戈夫曼本人并不十分欣赏分析性归纳法，也不会将诸如“分析性归纳”、“扎根理论”之类的标签贴于他的方法论取向，尽管扎根理论家认为戈夫曼的《污名》是汲取不同的资料来源形成扎根理论的范例。

第四，文献研究。该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二手资料的分析，相关文献包括关于不同行为类型的虚构或真实的描述。对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美国学术圈而言，戈夫曼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家，他没有使用传统实证主义者偏爱的“硬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相反，他大量使用小说、漫画、电影等文学艺术类的虚构素材和新闻报道等真实性无法确证的二手文献，以及礼仪手册、传记作品和私人信件等作为资料阐释经验活动片段。文献研究在《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 1974）和《性别广告》（*Gender Advertisements*, 1979）等中后期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例如，《框架分析》大量引用传记体裁的大众读物中的各类趣闻轶事。但对戈夫曼而言，这些趣闻轶事不是作为证据，而是作为“阐释性的描述”而呈现的。^②

总之，戈夫曼采用多种社会研究方法，与之相对应，他的资料库也可谓庞杂多元，从特定的社区和组织、报刊杂志、小说、信件与日记到广告图片和电台谈话等，都是他的研究素材和资料来源。戈夫曼的资料使用手法是杂糅的，他经常将各种文献资料穿插于田野经验材料之中。例如，在《公共场所的行为》中使用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对圣伊丽莎白精神病医院和设特兰岛自耕农共同体进行的调查；同时，他还频频援引礼仪手册和档案材料等二手文献。戈夫曼认为，这些材料可能并不完全可靠，他的阐释亦可能值得商榷，并且充满了未经系统性经验研究验证的断言，然而，“对基础性的行为领域而言，一种散漫的推测性方法优于对它的完全无视”。^③此外，这些阐释性材料符合统一的框架，它能够整合读者已有的经验片断，并指导研究者对制度性社会生活的个案研究。^④

戈夫曼从不避讳研究对象的主观性或“任意性”，不同的学术观点、日常生活经验、虚构材料等对戈夫曼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们都指向互动系统的普遍性阐释框架。戈夫曼在方法论上持开放或实验的态度，他更多的是展示可能性，而不是确定的事实。通过巧妙运用以上这四种虚实结合的研究方法，戈夫曼得以用新的方式重新组织经验材料，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和观念体系。也正是通过这些方法，戈夫曼能够广泛地摄取多种资料。对此，默里·戴维斯（Murray S. Davis）感叹道：“自齐美尔以来，没有一位社会学家能将如此广泛的、没有明显关联的事件和活动联系起来纳入到统一的框架内”。^⑤

三、资料分析方法

社会学家的田野调查是知识生产的重要环节，之后需分析与整理搜集来的资料，以得出令

① Greg Smith, *Erving Goffman*, p. 117.

②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p. 15.

③ Erving Goffman,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p. 4.

④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 Y.: Anchor, 1959, p. xii.

⑤ Murray S. Davis, “Review of *Frame Analysi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4, no. 6, 1975, p. 603.

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对很多社会学家而言,资料的搜集和分析往往是同时进行的。戈夫曼搜集的是质性研究资料,他不使用统计数据、测量和实验控制组之类的量化研究方法。在关于质性资料的分析方面,戈夫曼摒弃传统的思维模式,打破规范性的认知期待,使熟悉的事物“问题化”和陌生化。通过梳理戈夫曼的著述,可以总结出四种主要的资料分析方法。

第一,重新分类与命名。类型化可谓是戈夫曼思维的首要特征,他在很多著作中都采用分类的分析方法,从而将他新挖掘的经验材料赋予某种秩序性。社会生活的类型化有助于我们的理解与判断,增加现实的可知度和预测性,以获得相对安全、理想和秩序井然的生活世界。再分类是重新认识和谈论习以为常之物的的重要手段,戈夫曼通过独特的分类图式解构常识,将人们熟悉的事物置于另一种范畴体系,促使产生新的认知效果。他经常将这种方法与自然科学中植物学家和生物学家采用的样本收集和分类法进行比较。类型化的思维方式在《性别广告》和《框架分析》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性别广告》是关于广告如何强化性别角色偏见的研究,戈夫曼将图片作为定性研究的数据资料,这些图片也成为历史档案和现实的表征形式,这是他的研究的创新之处。戈夫曼从新闻报纸和流行杂志里搜集了 500 多条商业广告和新闻照片,他将这些照片分门别类,以展示和再现不同的性别主题,从而阐明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而在《框架分析》中,戈夫曼在主要的框架类型之下继续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种类型进行相应的定义。譬如,两种基本框架类型(首要框架与次要框架)可转换成五类调音(keying)、两类编造(fabrications)以及两类再转换(retransformations)等。通过这种具体的分类,戈夫曼使他的分析组织有序、条理清晰,并厘清概念上的混杂。

与分类法密切关联的是重新命名策略。概念创造是戈夫曼的另一思维特征,对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进行分类并加以命名,这是他的学术风格与智识偏好。戈夫曼擅长于为那些尚未命名的社会事物与实践赋予学理性名称,使它们由日常表达进入分析性的话语层面。戈夫曼创造、改造或挪用了许多概念,这些概念有助于分析和阐述互动秩序。例如,在《收容所》中,戈夫曼根据空间隔离、时间控制与分割等维度将监狱、集中营、修道院、军营等结合在一起,统称为“全控机构”。关于全控机构的分类可能并不彻底,但它提供了关于范畴的纯粹外延性定义作为具体研究的出发点,为探讨全控机构的普遍性特征奠定基础。^①总之,类型化、重新命名和概念创造既是戈夫曼重要的思维特征,也是他分析社会现象的重要工具。但它们只是权宜性的工具,因为经验世界的不同类别之间构成一种连续统关系,任何观念性的类别与概念仅是认知手段,它们无法替代现实本身。

第二,逆向论证。这是戈夫曼的总体性思维特征。类似于迪尔凯姆通过失范理解规范,戈夫曼通过“异常”研究“正常”,通过越轨理解规则,通过剖析非典型的、异质性的个案研究那些遭排斥的、处于劣势和从属地位的身份,如精神病患者、污名携带者和女性等,进而反观惯例化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世界。因此,研究人际礼仪的最佳场所是拘禁无法遵守这些礼节和规范的“异类”的机构。在公民社会里,个体之间相互展演仪式性游戏,互动情境必须确保适当的恭敬会得到同等的回馈;然而,在精神病院里,被收容者无法得到这种承诺。精神病院里的行为违反了恭敬和风度的基本行为规范,对这些偏离行为的分析突显出在精神病院之外的日常生活中,礼仪对于维持规范与秩序的重要性。精神病人在入院时经历的初始化剥夺过程祛除了自我的仪式性基础,仪式性关照下的神圣个体与精神病院里被羞辱的和被剥夺的自我之间形成鲜明的反差。一旦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文明社会中的个体若要保全自我所需

① Erving Goffman,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p. 5.

要满足的社会条件。宽泛而言，戈夫曼从与互动疏离的诸种现象来认识面对面互动的一般性特征。

与逆向论证相关的是非一致性视角。该观念最早由文学评论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提出，即“通过不一致性产生洞见”（*perspective by incongruity*）。^① 它通过并置不相关的社会情境或社会类型，甚至将两件截然相反的事情以某种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从而以相互矛盾的角度来看待某一现象，重估其意义，进而消解由文化建构的自我认知障碍。^② 例如，精神病院在分类范畴上接近于监狱和疗养院，因此，它兼具惩罚和监护性质。通过寻找反差、对比或反例，如出现情境危机、打破规范性秩序等来阐释日常生活的结构与功能，人们就能意识到原先被忽略的社会设置和行为逻辑。戈夫曼采用的非一致性视角具有两个特征：第一，通过在同一个语句中并置不同的观念或概念，从而创造非一致性；第二，通过有意识地选择独立存在的实体或虚构的意象，以增强这种非一致性。^③

第三，比较法。自孔德以来，比较法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方法。通过对不同事物类型进行比较能够产生新的知识和洞见，戈夫曼的导师休斯曾说：“可以通过研究管道工人了解医生，通过研究精神病学家了解妓女”。^④ 戈夫曼也广泛采用比较法，他指出在描述戏剧表演实践的特征时，较为慎重的做法是“从较小的单位入手，从社会机构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设置或者独特的社会身份入手，通过个案史以适当的方式记录各种比照和变化”。^⑤ 戈夫曼通过将极端的舞台化情境与散漫的日常谈话情境进行对比，突显出“非正式性”的构成，即日常行动中框架空间的自由度。戈夫曼通过比较现代社会中大量组织的特征而创造出“全控机构”这一理想类型，它与公民社会产生鲜明对比。菲利普·曼宁（Philip Manning）亦认为，戈夫曼采用的是“比较模式”的民族志研究法，它基于传统的共识模式，同时采取一种抽象的、理论的和观念创新的比较框架。^⑥

第四，复调论证。戈夫曼在资料分析过程中还经常采取复调手法，即从多重视角反复进行论证。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他的很多著作都是由相对独立的论文而不是前后连贯、逐渐展开论述的章节构成。例如，《互动仪式》由六篇相互独立的论文组成，《公共关系：公共秩序的微观研究》也由六篇独立的文章构成，每篇文章从各自独特的视角进行论证，它们构成一个整体以共同阐释公共秩序。《收容所》收录的四篇论文亦独立成章，但都是从不同的视角，最终聚焦于同一个主题，即住院病人的情境。同一本著作中复调式的主题论述可能会遭致读者的反感，但戈夫曼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从不同的分析视角重新切入主题。这种“多次进入”本身提供了一种分析性比较，从而强化各章节的论点和分析力度。戈夫曼认为，这种多次进入主题并从不同维度阐释同一个主题或观念的方法有其必要性，就像“给孩子穿上不同的外套要强于他们在

① John Lofland, "Early Goffman: Style, Structure, Substance, Soul," in J. Ditton, ed., *The View from Goffman*, London: Macmillan, 1980.

② Kenneth Burke, *Perspectives by Incongru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94-95.

③ Peter Manning, "Goffman's Framing Order: Style as Structure," in J. D. Ditton, ed., *The View from Goffman*, p. 263.

④ Everett Hughes, "Mistakes at Work," in *The Sociological Eye: Selected Papers*, New York: Aldine, 1971, p. 316.

⑤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p. 245.

⑥ Philip Manning, "Three Models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Wacquant as Risk-Taker," *Theory & Psychology*, vol. 19, no. 6, 2009.

唯一的华丽帐篷里瑟瑟发抖”。^① 复调论证也体现在概念的重新定义与不断重新开始的阐述，而这又具有交叉论证的效果。

上述四种资料分析方法在具体运用时也不是截然分离的，它们可以同时结合、交互使用。戈夫曼善于提出分类图式与概念体系，然后用选择性的事例加以说明，并调用隐喻使日常生活中原本习以为常的事物变得敏感化。通过这些资料分析技术，戈夫曼解构了日常语言中关于机构、关系、实践等传统分类模式，破除惯性思维及其背后的各种假定，从而为发现新的经验规律、产生新的理解创造可能。通过分析、综合、抽象和概化等方式，戈夫曼提供了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指导性“阅读”。

四、方法论批评与回应

诚然，并非所有人都认可戈夫曼的社会研究方法和资料分析技术，有些学者对戈夫曼的社会学研究持贬抑态度，批评它主题选择的任意性、概念使用的含糊性以及资料处理的粗枝大叶等，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②

第一，资料呈现过于随意、描述不够精准。尽管戈夫曼主张自然主义式观察，但他的著作（尤其是后期）很少有像传统民族志学者那样的详尽描述。例如，关于圣伊丽莎白医院的研究缺乏对该机构本身系统性、全景式的展示和交代，尤其是它的物理布局、运作机制、医护人员的构成以及具体治疗手段等，而这些都是传统民族志的基本要素。^③ 戈夫曼很少如实地展现原始的田野记录，尤其是研究对象直接以言语表达出来的感受，这使戈夫曼的文本更像是一种“准民族志”。因此，尽管戈夫曼可称得上是 20 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但却难以进入最优秀的民族志学者之列。^④ 在《谈话形式》里，戈夫曼没有像会话分析学者那样采用录音形式的会话资料，而仍然倾向于自然主义式观察以及各类虚构的事例。由于缺乏真实的谈话数据，戈夫曼的例证具有“正是如此”（*just so*）的特征，仿佛这些经验材料是被事先设计好来证明期望的论点和分析逻辑。^⑤

第二，研究信度问题。戈夫曼缺乏方法论和分析假设方面的反思，这成为他的“阿喀琉斯之踵”，使他的社会学丧失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激进潜质。例如，在有关精神病人的研究中，人们不禁会问：享有充分自由且心智健全的戈夫曼如何能够感同身受地体验并表达那些被违反意志强遭监禁的精神病人的生活世界？在《性别广告》中，戈夫曼对广告图片的选择不是随机抽样，而是采取目的抽样，也即戈夫曼在报纸和杂志上择取的是那些符合他的假设的广告图片。^⑥ 这在

① Erving Goffman,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p. xiv.

② 此处仅就方法论相关的议题展开讨论。关于戈夫曼的社会理论也有诸多争论，例如有批评认为，戈夫曼仍然使用一些传统的社会学假定，从而再生产了个体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社会互动与社会结构以及实践与观念等二元论。

③ Gary Alan Fine and Daniel D. Martin, "A Partisan View: Sarcasm, Satire, and Irony as Voices in Erving Goffman's *Asylum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vol. 19, no. 1, 1990, p. 93.

④ Gary Alan Fine and Daniel D. Martin, "A Partisan View: Sarcasm, Satire, and Irony as Voices in Erving Goffman's *Asylums*," p. 94.

⑤ Rodney Watson, "Goffman, Talk, and Interaction: Some Modulated Response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 no. 1, 1983.

⑥ Mee-Eun Kang, "The Portrayal of Women's Images in Magazine Advertisements: Goffman's Gender Analysis Revisited," *Sex Roles*, vol. 37, no. 11/12, 1997, p. 983.

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戈夫曼的社会学还给人一种幻觉，即看起来充满浓厚的经验研究味道，而实际上并没有提供真正的实证材料支持他的推理与结论。^①

第三，非传统的表述手法。有些经验研究者对戈夫曼大量采用二手文献资料很不适应，尤其是认为《框架分析》过于冗长繁琐，读起来沉闷乏味、让人厌烦，它与戈夫曼早期的行文风格迥然不同。甚至有人认为，《框架分析》即使减少四分之一的篇幅也不会对它要表达的思想有任何损害。^② 还有学者质疑复调手法，他们抱怨戈夫曼的著作存在明显的重复现象，读起来似曾相识。^③ 例如，沙洛克（W. W. Sharrock）对戈夫曼著作中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感到困惑：

如果以作为统一的智识产物的一部分来阅读这些类似的著作，你会对这一切感到疑惑不解——这些著作之间存在相当多的重叠，但它们都仿佛是以不存在其他著作的方式进行书写的。^④

这些批评本身或许不无道理，本文关于戈夫曼的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技术的论述其实已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些批评有所回应。不同定性研究者其哲学指导思想并不一样，因此难免存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戈夫曼的研究不是为了再现社会事实或生活场景，也并非为证明某种事实，而是追求一般化的形式理论，探讨关于人的行为的普遍性观念。在《公共场所的行为》里，戈夫曼明确表示其研究意图旨在提出关于交往形式与结构的分析框架。与大多数人类学家关注文化多样性或族群差异不同，戈夫曼的研究更具普遍性。他的论述通常采用普遍性术语，他描述的活动形式和社会机制可用于不同时空的社会互动。例如，戈夫曼关于拉斯维加斯赌场的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向读者呈现赌徒式行为或心理，而是冒险行为的普遍特征。尤其在《框架分析》里，针对其他著作里已重复出现的话题以及该书的大量脚注，戈夫曼如此解释：“我试图就这些话题整理我的思想，力图建构一种普遍性的表述方式”。^⑤ 因此，戈夫曼是在逻辑层次而不是在经验层次进行论证的。他的著作里经常出现不同抽象层次的事物合并在一起，而他也能够不同的文本间自由游走，从对美国社会的一般性讨论自如地转向对圣弗朗西斯科某条人行街道的观察。^⑥ 戈夫曼描述的骗子、精神病人、污名携带者等边缘人群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所有人的特征。虽然精神病人违反规范的行为发生在病房内，但是“被打破的规则却是普遍性的，这使我们从病房向外延伸至对英美社会的一般性研究”。^⑦ 总之，戈夫曼关于微观生活世界的研究旨在提出普遍性的阐释框架，即使他的民族志也是抽象的，是以理论为导向的。例如，《收容所》并非是关于圣伊丽莎白医院的个案研究，而是系统性地阐述“全控机构”这一概念。换言之，戈夫曼从事的不是关于场所的民族志，而是概念的民族志。^⑧

戈夫曼对自己的分析方法有着敏锐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意识。在对邓金（N. Denzin）和凯勒

① Emanuel A. Schegloff, "Goffman and the Analysis of Conversation," in P. Drew and A. 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② Murray S. Davis, "Review of *Frame Analysis*."

③ Alan Dawe, "The Underworld-view of Erving Goffma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4, no. 2, 1973, p. 246.

④ W. W. Sharrock, "Review of *Frame Analysis*," *Sociology*, vol. 10, 1976, p. 332.

⑤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p. 14.

⑥ Philip Manning, *Erving Goffman and Modern Sociology*, p. 77.

⑦ Erving Goffman,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New York: Pantheon, 1967, p. 48.

⑧ Philip Manning, *Erving Goffman and Modern Sociology*, p. 9.

(C. Keller)的《再论〈框架分析〉》(1981)^①一文的回应中,戈夫曼承认《框架分析》“到处充斥着笨拙、臃肿的类型学”,^②但他不认为这些分类是不必要的抽象观念、偏离了意义赖以产生的日常经验和过程。相反,这些分类概括了人们为理解他们的生活经验而采用的互动策略,这正是研究日常生活经验和过程的必要前提条件,倘若缺乏这些抽象的分类概括,那么社会学家只能从事具体而琐碎的个案研究。戈夫曼也意识到非系统性的自然主义式观察本身存在许多问题,因为它不仅需要对特定的个体或群体作出陈述,而且这些阐释对象的身份与边界都不甚清楚。然而,“如果在探索性分析中尝试着将当代社会生活的碎片编织起来,那么就有必要在没有充分的定量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大胆的断言”。^③因此,对公共场合中各种类型的社会实践形式作出“未经证实的断言”是一种“必要之恶”。假设性的、非经验的观察对于提炼、完善概念框架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这是知识积累过程中的必要方式。^④

在关于精神病人的研究中,由于内群体具有为其成员提供支持、自我调适等功能,并且他们对医生、护士和亲戚等外群体成员持有偏见,因此,若要忠实地描述病人的情境,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种偏袒性的视角。戈夫曼也明确承认,在进入圣伊丽莎白医院时,他对精神病学科及其实践内容并非满怀敬意。此外,在谈及社会研究的比较问题时,戈夫曼指出使用英美社会之外的事例“并非想表明这里阐述的框架不受文化制约,也并非想表明它能像在我们自身社会里那样运用于非西方社会生活中同样的领域”。^⑤也就是说,尽管戈夫曼采用了非西方社会情境行为的文献,但他所探讨的是西方社会,其论述主要适用于“美国中产阶级的行为”。^⑥他还提醒读者他的社会学观点更多地是从一位美国中产阶级男性的视角出发的。因此,戈夫曼探讨的行为或现象存在群体—文化间差异。^⑦对戈夫曼而言,了解差异性是为了更好地寻找共同性,但这种对普遍性的追求是有限度的。

戈夫曼广泛使用新闻报纸、传记、小说、戏剧等作为支撑材料研究互动行为,那么,他如何看待特定文本和经验材料的有效性和代表性?在1980年的一次学术访谈中,戈夫曼指出,他使用特定的案例旨在阐明某些情况下事物的发展进程,而不是确定在任何情况下一定会发生什么。它只是一种试验性地呈现,不是为了肯定性的结论。《框架分析》之所以被不少人指责,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使用的很多资料仅是一些摘自报刊杂志的片断。对此,戈夫曼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能从报纸那里得到有效的资料,而是它将你限定于你所谈论的社会事实,这样就不致于宽泛地谈论各种社会过程”。^⑧也就是说,这些剪报性质的材料不仅起着确证谈论主题的作用,它们还限定其可能被过度延伸的意涵,从而防止得出过度概括的结论。这些资料本身亦展示了讨论的边界性。戈夫曼的内心或许很清楚,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社会学家能做的其实很有限。因此他无心纠缠于方法论争论,也不愿意介入学术论战。与传统、主流(定量或宏观)的社会学家相比,戈夫曼对学术的态度显得更加谦逊。他更多地将社会学研究看作是一门艺术。

① Norman K. Denzin and Charles M. Keller, "Frame Analysis Reconsidere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10, no. 1. 1981.

② Erving Goffman, "A Reply to Denzin and Keller,"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10, no. 1, 1981, p. 68.

③ Erving Goffman,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p. xiv.

④ Robin Williams, "Understanding Goffman's Methods," in P. Drew and A. 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⑤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p. 244.

⑥ Erving Goffman,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p. 5.

⑦ Erving Goffman,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p. 41.

⑧ Jef C. Verhoeven, "An Interview with Erving Goffman, 1980," p. 340.

他采用的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技术也是一种“技艺”，甚至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也正因如此，戈夫曼拒绝制定或接受任何方法论原则。

结 语

戈夫曼通过观察面对面互动研究日常生活经验，并关注互动的情境化（共同在场）特征。与传统社会学的宏大研究对象或单元不同，戈夫曼通过微观分析理解互动秩序，这是他终身关注的议题。为了展现和分析面对面互动系统这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戈夫曼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诸如典型的民族志田野研究、系统性的参与观察、非系统性的自然主义式观察以及广博的文献研究等，从而最大程度地呈现出微观互动领域的轮廓。在资料分析方面，戈夫曼巧妙地使用分类图式、举例法、逆向论证、复调等，在建构一般性互动理论的同时亦解构常识性的假定。戈夫曼之所以采用非常规性的资料搜集方法和不拘一格的资料来源，是由于他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定位及他的研究对象决定的。大体而言，戈夫曼的社会研究方法既具有形式化和系统性的特征，也具有印象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

戈夫曼的社会学系统性地勾勒出一个原先被人们忽略或无法言说的领域，该领域人人都熟悉，却从未对其进行过严肃的考量。戈夫曼采用的探索性研究方法在形式上是开放的，就方法论而言，很难将它进行归类。^① 戈夫曼认为，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方法应该是自然主义式的，可以说“自然主义式经验主义”是其研究方法的重要特征。也正因如此，在某些社会学家看来，戈夫曼的研究风格具有某种“原始特征”，甚至难登大雅之堂。戈夫曼对社会学并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没有过多地赋予这门学科尚无法担当的使命。他对自己的研究抱着平和的心态，仅从方法论上阐述并践行如何研究面对面互动，而无意兜售研究范式。尽管如此，戈夫曼的资料搜集和分析方法为我们提炼出很多有用的概念分析工具，重新赋予杂乱无章的社会事实以秩序，并给人以方法论上的启迪。

最后应指出的是，戈夫曼虽无意测量社会规范或互动行为发生的频率和分布，但他没有对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民族志或抽样调查等不同的社会研究方法做出高下优劣的评判。事实上，他并不反对小群体实验法本身，只是认为这种方法对于研究特定情境里的互动并不是特别奏效。因此，为了获得精神病人机构生活的民族志细节，戈夫曼没有采用传统意义上的测量法或引入控制变量，在他看来，“为一些陈述搜集统计证据所需要的角色和时间将会妨碍搜集关于病人生活的组织与构造的材料”。^② 概而言之，戈夫曼并不反对量化研究，也不像布鲁默那样激烈地抨击定量社会学的缺陷，他反对的是用量化的工具去获得主观的经验。^③

〔责任编辑：李文珍〕

① Candace West, "Goffman in Feminist Perspectiv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 39, no. 3, 1996, p. 355.

② Erving Goffman,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p. x.

③ Jef C. Verhoeven, "An Interview with Erving Goffman, 1980," p. 332.